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莫大
孔道
無知
爭駛
不測
見而
無可
巡捕
者有
風馳
路日
西通
甫六
歲至
路橋
戲食
黃平
讓遠
路地
幸
馬性
通客
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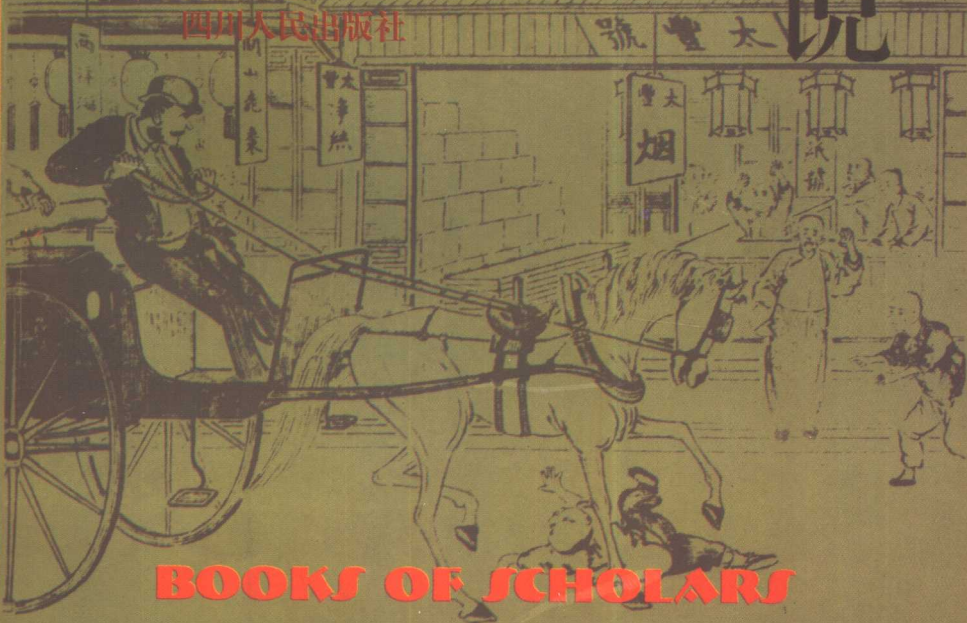


良馬通靈

未完成的叙说

UNFINISHED RELATING

四川人民出版社



BOOKS OF SCHOLARS

黄

平

未完成的叙说

UNFINISHED RELATING

UNFINISHED RELATING

未完成的叙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解 伟

封面设计：钟 鸣 唐璟萍

技术设计：王 力 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未完成的叙说

黄 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8.25 字数 189 千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06—9/C·382 印数：1—3100 册

定价：16 元

前 言

本丛书为四川籍中青年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选集。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孕育了众多的风神俊逸之才。但由于“贵远贱近”之风使然，今人易首肯古代诗人哲人，而对现代学者则多持一种更审慎的态度。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文化上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使现代学者相对于古代学者而言，似乎有了更大的承负。这砥砺了当代学者的学术品格。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思想和学术的广度上有新的开拓，为本世纪中叶一度中断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当代学术中的“川籍学者”的提法，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事实上，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一切界限的绝对划分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去看当代学者的思想形成、文化素养和言述方式，或许会生发出一种新的意味和新的结论。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视，其意义当亦在此。

我们欣然推出这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在全中国引起反响的川籍学者的著作，并有意地从出版者的角度、以地域文化的眼光展现当代学术，以期研究当代中国学术提供一个文化地

ENG 7 / 10

缘学的背景框架。

这套学术文丛具有开放结构。首批推出的是学术界近些年读者较为熟悉的学者的论著。今后将进一步扩大，使出版学者“有分量著作”真正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对丛书提出批评建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2

目 录

- 1 自序

第一编 社会学与现代性

- 9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
13 解读现代性
27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变迁的参与者和体现者
41 从亲缘关系与社会交往看个体私营企业家的兴起
58 面对市场挑战的中国自然科学家
86 启蒙的神话与市场的逻辑
——关于知识分子与市场逻辑的对话

第二编 面对消费主义

- 97 消费主义对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影响
113 私人轿车与消费主义
129 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
138 促进与冲击:对农业的影响
163 寻求生存的冲动:从微观角度看中国农民
非农活动的根源
187 对农民寻求非农活动的社会学阐释

第三编 从海外到海内

- 205 断想《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214 从规范化到本土化：张力与平衡
220 教化的困惑
225 公共秩序的建构及其限制
229 社团研究：新的领域 新的探索
——简评《社会中间层》
232 教育和知识也可以买卖？
235 网络带给我们什么？
237 我这样听歌剧

附 录

- 241 跋
243 本书引用文献资料
253 学术简表

自序

在由士农工商组成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工商的地位是不如士和农的，道理也无须多说，否则传统中国社会就不是传统社会了。按照费孝通等前辈学人的说法，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地就是由士和农构成的，前者是所谓的绅士，后者是所谓的农夫。

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不论初看起来多么富有诗意和田园色彩，到了晚清终于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无情挑战，偌大一个中国也终于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等到我这一辈人来到人世的时候，这种内忧外患正好已经有 100 余年了。换句话说，不论我们今天的职业是什么，往前追溯，不超过三代五代，恐怕绝大多数人的先辈都要么是绅士，要么是农夫。绅士也好，农夫也罢，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基本成员。他们的基本区别，不外乎体现在对两个东西的占有的多少上面：土地和知识。占有得多的，构成了绅士，占有得少的，组成为农

夫。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喜欢查三代。不但遇到“大事”（招工，参军，入党，提干，……）要查，就是每年放完暑假再到学校报到，也得填家庭出身，而且得按前三代的成分填。这又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也和农村有关系。

我的父母，一个生在清朝末年，一个生在民国初年，到我懂事的时候，只知道他们都是念过大学的，按照当时的标准，都算是知识分子，却不知道他们原来都和农村有那么紧密的血肉联系。“文革”再往后发展，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主要成员，又都先后变成了农村社会的一分子。

再后来，“文革”结束，我们兄弟姐妹都进入了大学学习或工作。到今天，一家人从父母开始，都既当过农民或来自农村，又做过“知识分子”或在大学工作。

但是现在已经是世纪之末了，中国社会也正向着现代性艰难地转型，因此我们家这个“士——农”构成，已经不是简单地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写照或体现。我的父母不用说了，他们经历和目睹了清末以来全部曲折而壮阔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他们自己就是这一变迁的参与者和当事人；我们也不是直线般地走着一传统→现代、农村→城市的进化式道路。相反，从城市到农村，又由农民变工人，最后到今天，暂时以“读书人”的身份观察和体验着日益加速的中国现代性社会变迁。

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在我（们）自己所走过的有限的时光中，每一段都是和社会本身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又不断地在社会的变革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

现在，我算是在学术领域里谋生（思考，写作，编辑）。对于传统的学者或书生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思考和写作基本上是合二而一的过程，但是对于如今的所谓社会科学，则另当别论。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在取得基本的第一手经

验资料之前，写作充其量只能是初步的，其也可以包括诸如理论构架、文献综述等系统性的东西，但毕竟，在研究与正式写作之间，有了一段时间上的区分。其实，即使在再传统的学术中，“思”与“言”也不是一回事，而今天的所谓社会科学，倒是常常花了大量时间做调查、访谈、收集和整理数据，等等，却没有多少时间来真正地进入“思”的状态，然后就直接下笔千言，大卷大卷的著作充斥于书市书摊。

我原本学的是哲学，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也还没有社会学。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毕业后留校教书的时间里，基本上就处在“思”的状态之中，没有勇气让自己参加到“言”的行列。这主要倒不是因为越学哲学就越体会到我们的先哲说过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是由于当时还健在的几位哲学前辈一再告诫我们：多读，多想，少写，别发表。

这样的告诫，我奉行了至少10年。还没有来得及“言”，又转入了社会学领域，一开始是想在我的家乡四川做点地方色彩较浓的文化研究，例如以成都的茶馆为入径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当时并不懂这一概念），又转念想探寻四川的彝族家支的奥秘，和朋友们去跑了一趟，还没有正式开始，接下来就是到北国读研究生、出国（“深造”？），只好把这些幼稚但不乏魅力的想法统统置之脑后。

在国外，主要是想利用机会多读点、多思点。但是既然是做“研究”，就不能只是读和思，按照那一套学术制度，你还必须做出自己的建立在第一手经验资料基础上的原生性的东西来。这种制度迫使你不断参加各种形式的 Seminars，不断地去“言”，把自己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示众。

话虽如此说，真正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实在是很难。这里收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那篇文章，是根据几篇论文综合而成的，它们都写于1992年回国以后，但却是自己思之多年、又在英

国做了几年所谓“研究”之后的产物。当时在英国还做过一些“个案”，由于篇幅太长，这次一概没有选，多数甚至还没有写成（不是译成！）汉语。我确信费孝通等前辈学者早年说过的话，认识和研究传统的中国社会，一是不能忽视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村人口，二是要关注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虽然近代以来，士大夫阶层衰落了，但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多么脆弱，总是出现了，并且他们的经历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写照，他们本身也是这一变迁的主要参与者和当事人。

做完博士论文以后，我在阅读与思考过程中，逐渐意识到 A. giddens 所说的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不但不仅仅是传统上文人士大夫修平治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近代以来所谓自由漂游型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立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专家和制度交织而成的抽象系统及其产品不断卷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单就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是有局限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部分的教育，科学，及其产品，要么通过国家的力量要么通过市场的法则不断从中心向边缘渗透和蔓延，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大多数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认识。在做博士后研究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在市场驱动下，各种各样用科技包装起来并且确实带有浓厚的科技含量的消费品，怎样一步一步进入到中国社会，包括它怎样进入普通家庭并影响中国社会和它的普通成员的。这样一种现象，我做博士后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也是我的博士研究的导师之一）L. A. SKLAIR 把它称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本集子所收录的几篇关于消费主义的文章，就是上述思路的部分写照。

本集子里的另一类文章，是关于农村人口寻求非农活动的。这些文章建立在我和我的同事们近年来对农民外出务工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的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它们试图用一种比较新的

社会学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一现象，在作为制约因素的结构和体制同作为社会实践的行动主体的农村人口的种种积极尝试之间寻求一种双向的（而不是二元的）阐释。

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是消极的受动者，又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回到思与言的话题上来，这个集子如果说改变了原来自己遵奉的“多读，多想，少写，别发表”的信条，也只不过是试着思、试着言而已。

谨以此献给我的父母和所有曾经给过我教益的师长。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

解读现代性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变迁的参与者和体现者

从亲缘关系与社会交往看个体私营企业家的兴起

面对市场挑战的中国自然科学家

启蒙的神话与市场的逻辑

——关于知识分子与市场逻辑的对话

第一编

社会学与现代性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镇化，以及以它们为表征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各种形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社会学，既是对这种变迁及其后果的理解与阐释，又是这种变迁的后果与原因。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理论。

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晚清以来的社会动荡、革命、急变和与外部世界的冲撞以后，也开始了自身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镇化历程，社会学因此应运而生。受当时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成就包括自然科学的成就所震撼，中国社会学的前辈和先驱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学科，创建了自己的社会学系，并开始了研究中国社会本土的社会问题的艰辛

* 本文是作者提交给 1997 年夏在北京举行的“中日两国学者文化与知识共同体”研讨会的提纲。

探索。

很明显，这样一种学术和学科，必须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剧烈变迁相吻合，才能生存和发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历史的迂回曲折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就其复杂性而言，一点也不亚于自然界；它的变迁所蕴涵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交织的多维图景，不可能通过一次或几次政策层面的运作而被简化、被忽略、甚至被取消。

在近 20 年时间里，是中国社会本身进入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高速的社会发展时期，这就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和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认识场域和发展机遇。重新认识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机制，重新认识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

今天，当我们来审视社会学和它的学科性质与学术品质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

首先，社会既不是简单地从个人开始，也不是外在地给定的所谓整体，相反，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在时间——空间中发生的不断实践过程，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互动，到地区间国家间的冲突与平衡，都既有“内在衍变”又有“外部冲突”，是内外彼此交织、主客相互渗透的发展变迁历程；

其次，社会学并不是对某种既定的外在客体之普遍性绝对性的认识，因为，所谓社会，只是由于人类主体的积极行动才得以被创造和再造出来的，而这一创造与再造过程又是由其一代一代的成员所从事的行动来实现的，虽然社会成员达到这些行动饱含着他们对社会的知识和改变社会的技能，社会成员们并不一定都能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预期到这些行动的后果；

再次，社会学（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与阐释，是双向的，即是说，社会科学在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并理解社会和组成为社会的个人的同时，社会